

“发明个体”背后的“理性狡计”

■韩连庆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论述宗教改革时曾说：“伟大的革命是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中才出现的。”也就是解放了精神，将神性带进了人的现实生活中，并且支配了现实生活。

例如，宗教改革之前，在教会的范围内，婚姻虽然不完全是不道德的，但节欲和独身总是被认为更高尚。而在宗教改革之后，婚姻变成了神圣的制度。贫困曾被认为高于拥有财产，但是后来，靠自己劳动过活，从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中获得快乐，才更合乎道德。此前，盲目的服从曾被认为是品德，而现在，自由被认为是神圣的，个体如果没有自由，就不能与人发生精神关系，不能在精神中礼拜上帝。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黑格尔认为，宗教改革比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更重要，对现代观念的产生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对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革命与新教的论述，可以说都秉承了黑格尔这一论断的余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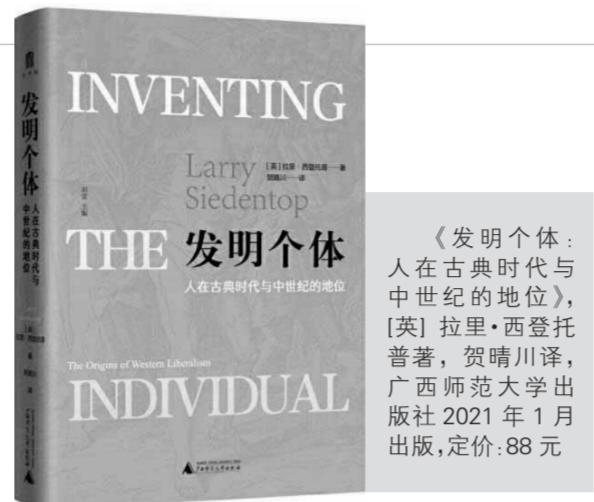
英国思想史家拉里·西登托普在《发明个体：人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地位》中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基督教发展出的这种自由主义的世俗主义，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为此，他采取了一个新的视角：个体是如何出现并逐渐取代了家庭、部落和种姓而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的。

从书名来看，“发明个体”和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美国历史学家戴维·伍顿的《科学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Science)，中译本翻译为《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一样，都认为“个体”“传统”或“科学”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发明出来的。

西登托普认为，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钦慕古人，对中世纪大学和教会里的经院主义抱有敌意，这导致了在随后几个世纪的历史写作中，“故意尽可能缩小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在道德和智识上的距离，同时尽可能拉大现代欧洲与中世纪在道德和智识上的距离”。

在这种历史观的观照之下，就认为古代世界是世俗的，公民免受教士和有特权的教会的压迫，而中世纪的教会试图实现神权政治，思想

实际上，在古代世界中，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它赋予等级秩序以合理性，倡导的是“万物各在其位”。即使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也没有把自由和责任赋予个体，没有充分孕育出一种基于个体权利观念的伦理。



遭到了迷信和教士私利的钳制。但是所有这些看法都是没有依据的，只不过是政治论战的武器，遗漏了一些基础事实。

二

实际上，在古代世界中，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它赋予等级秩序以合理性，倡导的是“万物各在其位”。即使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也没有把自由和责任赋予个体，没有充分孕育出一种基于个体权利观念的伦理。

例如，亚里士多德把德性解释为“节制”，但这种“节制”却是一种“骄傲的节制”，是古代公民在比他们低等的人面前应该具有的。

因此，“古代理性主义与等级秩序沆瀣一气，认为理性就是某一超越阶层的特有属性。”要而言之，古希腊并没有自由的观念，或者说，自由只属于特定阶级，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个体的观念。

在后来兴起的基督教思想中，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上帝是自由的，因此人也是自由的，人的自由和上帝的自由相互得到了加强。西登托普认为，在这种思想的发展过程中，

基督教圣徒保罗发挥了关键作用。

保罗通过重新解释基督的观念，主张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孕育出了一种平等主义的道德直觉。他把自由和意志联系起来，提出了一种“基督徒的自由”，也就是说，要想得到真正的自由，先得成为有道德的人，这就削弱了自由作为一种特权、社会地位或等级的古代观念，颠覆了古代思想一直依赖的自然不平等的前提。因此，保罗的基督教观念创造了个体，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奠定了基础。

不过，在基督教后来的发展中，它所孕育的道德平等也为限制权威的权力奠定了基础，从而开始反对教会的教义和体制，由此诞生了自由主义的世俗主义。

三

西登托普遵从流俗的说法，把这个现象称作“双刃剑”，也就是说，凡事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例如我们经常说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造成灾难，所以我们要让科技为人类谋福利，消除科技的负面效应。

但是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这种“双刃剑”的看法是典型的知性思维方式，把事物的两方面视为抽象的、静止的和僵化的。

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曾说，哲学就是跟“与”作斗争，跟这种认为事物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的看法作斗争。他的辩证法是从运动变化的角度看待事物，认为事物在运动的过程中会通过自己否定自己而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好的方面会变成坏的方面，坏的方面会变成好的方面，而不是说事物有好的一面与坏的一面，我们要消除坏的方面、保存好的方面。

马克思深得黑格尔哲学的这一要义，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曾提出一个著名论断：“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占优势。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因此，“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

基督教所孕育的平等主义的道德直觉本来是“好的方面”，结果却转而反对教会的教义和体制，变成了“坏的方面”，诞生了自由主义的世俗主义。

从表面上来看，基督教和世俗主义是对立的，一个有信仰而另一个没有信仰。但是如果深入下去会发现，这种对立其实是虚假的，基督教最核心的是平等主义的道德洞见，而自由主义的世俗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平等的自由，两者看似对立，其实却是“同一”。

更进一步，世俗主义并不意味着没有信仰，“世俗主义界定了一系列条件，据此使得人们的本真信念能得到塑造和保护。它开启了通向真正信仰的大门，使得区分内在信念与外在服从成为了可能”。

因此在美国，世俗主义被视为基督教所提出的本真信仰的一种条件。或者也可以说，世俗主义信奉的是“平等的自由”，这种“无神”的信仰才是本真的信仰。

作为思想史家，西登托普在本书中描述了个体概念从古代城邦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过程，触及到了这一思想历程中的诸多吊诡之处。

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这一历程却符合他的概念辩证法，由此可以揭示出这一思想历程背后的“理性狡计”(cunning of reason)：无论基督教还是世俗主义，都是个体概念实现自己的手段。

域外

本书概述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以前的预测，是预测个体的命运；现在的预测，则着眼于宏观社会经济的未来。



■武夷山

2020年9月，英国伦敦的Reaktion Books出版社出版了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荣休教授、著名军事史专家Martin van Creveld(马丁·范·克雷维尔德)的著作《Seeing into the Future: A Short History of Prediction》(本文作者译为“展望未来：预测简史”)

预测未来的能力对于现代社会至关重要。没有预测，则无法面对人口增长或是天气模式的变化做出规划安排，无法预知产品需求，无法进行库存管理。那么，自古以来人们是怎么做预测的？他们置于预测之下的基本假定是什么？他们采用了哪些预测方法？不断增强的计算机算力和先进的算法改善了我们预测未来的水平吗？还是说我们的预测水平与祖先的占卜水平其实也就半斤八两？本书认真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就预测之历史、现状与未来给出了精到的看法。

美国Technology and Culture(《技术与文化》)杂志2021年第一期发表了出生于荷兰的女学者Jone Van Dijk对本书的评论文章。她写道：

“美国总统林肯曾说过：‘预测未来的最佳方式是创造未来。’克雷维尔德在本书中也说，未来是不可预测的，除非你自己创造未来。虽说预测未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人们总是对此孜孜以求。”

“本书考察了自古至今人们展望未来时采用的主要方法。预测的性质和预测哲学一直是历史学者的关注对象，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德裔美国哲学家Nicolas Rescher的Predicting the Fu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Forecasting(《预测未来：预测理论导论》)和德古意特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德国奥格斯堡大学现代史教授Elke Seefried女士的德文著作Zukunfts(《未来》)便是典型代表。”

“克雷维尔德在本书中聚焦于预测方法之历史演变，对于前人的研究文献是很好的补充。技术进步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展望未来的需要，尤其是大数据和算法模型的出现使人们对预测这一深刻的人类活动再度产生浓厚的兴趣。”

“本书介绍了人们逐渐采用的一系列预测方法：猜想、推理、趋势外推、民意调查、问卷调查、建模等。此时的预测者认为，通过了解过去就可以了解未来，于是他们采用各种新工具来搜集信息，以识别事物发展的模式，应用周期逻辑来辅助判断。”

“20世纪早期，有关国家设立了一些机构，让其利用新技术来系统收集社会数据、人口数据和金融数据，于是包括统计学和问卷调查在内的经验方法逐渐发展成熟。由于电话的普及，1945年之后，民意测验这种新方式出现了。数十年之后，由于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能够建立起计算模型，预测个体遭遇交通事故的概率。”

“总之，技术进步显著影响了基于科学的预测方法，而技术进步与预测方法都与政治家的需求密不可分：他们不仅要预测未来，还想管理和控制未来。Jose Van Dijk女士认为，考虑到这个需求，本书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还不够细致，比如，是哪些人在哪种类型的预测活动中采用部署了辅助预测的相关技术。”

“预测技术与方法在形塑社会变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公众对于每一种新的预测方法的接受过程都能反映这个作用。”

“本书概述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以前的预测，是预测个体的命运；现在的预测，则着眼于宏观社会经济的未来。古代的算命者和祭司若能做出个性化的准确预测，如某武士在一场比赛中的胜算有多大，则将声名远播，而现代战争技术能够让战略家就战役胜负前景建立模型，以此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命运。”

“基于同样的道理，先进监控技术现在不仅用来追踪人类个体的线上行为，某些国家还利用这些技术来引导和操纵消费者的需求，从而控制社会行为。”

“‘预测’这个词就是与未来挂钩的，克雷维尔德倒过来研究预测的历史，所以本书选题趣味盎然。”

人类画笔瞄准自然已有万年

■陈华文

大自然是艺术家表现的重要主题。大自然给艺术作品赋形，艺术创作中随处可见自然之美。翻开中外美术史不难发现，艺术与自然如影随形，两者亲密无间，共同构建瑰丽的美学高峰。《当自然赋予艺术灵感》一书，为我们从更开阔的视角认识自然与艺术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本书作者艾莱娜·穆尼埃为艺术史学家，在卢浮宫艺术学校任教。全书图文并茂，从“面对自然的绘画”“古代绘画里的自然”“中世纪蒙昧的自然”“绘画是对自然敞开的一扇窗”“鲜活、变化的自然”“启发灵感的植物肖像”等九个篇章，从一幅幅与自然主题相关的画作作为切入点，将自然与艺术的故事娓娓道来。

说到底，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就是人类对自然的态度。

对自然对象的描摹，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里的岩画《受伤的野牛》，绘制于一万多年前，这应该算人类最早的画作了，同时也是最早表现自然主题的画作。

长达近两米的画幅中，野牛四肢蜷缩在一起，头深深埋下，背部则高高隆起，显示出因受伤而痛苦不堪的样子。值得注意的是，聪明的原始人巧妙地借助岩壁的天然起伏构成动物的身形，取得了惊人的表现效果。从表现技法上看，这幅画的色彩以赭红与黑色为主，都是天然矿物颜料，其成分主要是动物血、炭灰等，当时所用的“画笔”则可能是由苔藓类植物或者兽毛、骨管等制成的。

公元一世纪，罗马马西莫浴场宫的壁画《莉维娅的山林》，是一幅风景主题的画作，以绿色为主色调，郁郁葱葱的山林和欢快的小鸟，让参观者欣赏之后感到惬意。这幅画作倾向写实，在造型、色彩方面，忠实地描绘的对象。

当然，这个时期的写实风格还处于摸索期，真正形成成熟的写实风格，是几百年之后的事情。这幅画的主要价值在于，无名的画家把笔触瞄准了自然界的动植物，并且有意识地突出刻画的重点，画面的虚实关系拿捏颇为到位。现在看这些绘画技法很平常，可时间朝前推演两千年，就不得不令人称奇了。

1500年前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在创作主题上，不再受制于宗教题材，而是把画笔转向真实的、普通的人以及身边客观的自然、森林、河流、瓜果、花卉等等，大自然已成为画家不可或缺的描绘对象。而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探究自然，也成为博物学家、动植物学家的重要任务。

达·芬奇对植物有着深厚的研究兴趣，在素描手稿《花卉研究：伯利恒之星》中，可以看出一代绘画大师对花卉描绘是何等的精确、多么富有耐心。对于绘画与自然的关系，他说过一句名言：“谁非自然，谁就是非自然。”

此时，还出现了一批擅长表现瓜果蔬菜的画家，如阿尔钦博托、布克莱尔、卡拉瓦乔、宾尼、海达等。

布克莱尔的油画《水果蔬菜女商贩》，整个画面中，女商贩看上去美丽而干练，但她位居画面偏右的位置，那些白菜、胡萝卜、苹果、葡萄等果蔬才



英译
当自然赋予艺术灵感
艾莱娜·穆尼埃著
张文
月出版
2020年
定价：180元

是真正的“主角”。画家表现出高超的写实技巧，对于造型、色彩、光影的组合运用，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500年后的今天观看该画作，依然充盈着扑腾的生活气息。

19世纪中叶，画家们对大自然的描绘已经成时尚和风潮。法国巴黎郊区的一个叫巴比松的村庄，一批画家以描绘自然为中心，代表性画家有卢梭、德拉佩纳、特罗容、多比尼、雅克等，在美术史上被誉为巴比松画派。

巴比松画派，把对自然的描绘推向了一个新高度，画家们反对学院派画家在室内画风景画，走出画室在自然光下对景写生，然后以写生稿为基础，进行风景画创作。他们这种力求获得真实新鲜的感受和使画面色调明亮起来的艺术主张和实践，给欧美风景画家，包括印象主义画家以重要启示。

如果说巴比松画派描绘的自然是一首协奏曲，那么后来的印象派描绘的自然则是一首交响乐，莫奈、米勒、西斯莱、高更、梵高、德加等画家，在描绘自然的过程中，已经摆脱写实造型的束缚，着重表现自然光线的千变万化，在他们的画作中，表现对象包括田野、菜地、睡莲、水塘、树林、天空等方面。

莫奈曾花费大量精力表现睡莲，尤其是一天当中不同时段、不同光线下的睡莲。原本平淡无奇的睡莲，在他的笔下熠熠生辉。

在梵高短暂的绘画生涯中，不厌其烦地描绘星空、向日葵和麦田，深蓝、金黄之色调，成为他描绘自然的标志性色彩。

印象派是美术界的追光者，他们描绘大自然，由客观走向主观，更注重呈现心中的自然和风景，他们的笔触和色彩彰显张力，赋予自然更多的生命力和十足的个性。可以说，印象派的画家们是描绘自然的“先锋战士”。

不得不说，本书针对自然与艺术的叙述，是从西方美术的视角出发，这种视角显然存在不足，中国传统绘画在自然与艺术上的追求与成就，显然不能避开。

当然，自然与艺术的关系绝非一本书能说透。本书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深入思考自然与艺术打开了一个扇门。



《烧掉数学书：重新发明数学》，[美]杰森·威尔克斯著，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定价：98元